

“我想念长安，怀念长安”

——尚长荣往事补遗



尚长荣(右一)出席本刊“百期”纪念座谈会时与本文作者在一起

长荣到了上海。经济腾飞、日新月异的上海,迅捷地托起了这位实力雄厚的“老将新星”扶摇直上,成为享誉全国、“德艺双馨”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记得他由陕西京剧团调往上海京剧院前夕,我陪作家月赓曾到翠华路的住地采访过他。那是月赓应约为《家庭》杂志写一篇尚长荣家庭生活的文章。当时正值《曹操与杨修》在西安演出不久,这位中国戏剧梅花奖、白玉兰奖、全国京剷新剧目会演一等奖的得主,更以“活曹操”的美誉与上海京剧院结下不解之缘而名声大振,成为一时神州大地名驰遐迩的风云人物。

当时,他谦逊地侃侃而谈,热情地为我们放他演出剧目的录像,兴奋地谈他在上海京剧院排《曹》剧的深切体会。一向谦逊认真的长荣,仍带着陕西人那种待人处事纯朴、诚恳的态度,怀着极大的创作激情,细致地研读剧本,琢磨剧

□杜耀民

中曹操的性格特征,横向借鉴吸收话剧表演艺术之所长,以弥补戏曲脸谱化、程式化的不足,力图出色地表现出曹操的内心世界。他说剧中每个自己设计的表演动作,都事先一一请教和征得导演马科的指导和认可。这使易于激动善解人意的马导,这位曾在陕西求学、工作过、十分熟悉陕西人的老艺术家,情不自禁地当着排演场上全体演职人员的面,厉声喝道:“这里有一位最不要脸的演员就是尚长荣!”一时人们为之惊愕!“他每个动作都要问我。”这时谁还会不明白这严词厉声中包含的彼此间的尊重和敬意呢!长荣还甜蜜地回顾他与马骊丽的爱恋经历,说他每次出访归来,她都要送上一束鲜花。

应该说几次采访,他都是热情而周到的。但我总觉得在他的眉宇与神态中,隐藏和流露出一种不安。

此后不久,他和明珠忽然来到我家,说他就要调往上海京剧院了。他走后,让我在事业上多关照他的师妹。这并未使我吃惊,有关他的调动,我已有所风闻,但长荣却始终向我只字未提。我们彼此无言,相对默默坐了许久。

这一切,都历历在目,而长荣离陕调沪分别有时了。这多年,他在上海的情况到底如何呢?

1993年,适逢第三届中国戏剧节在福州举

行,我们一行十人有幸去福州观摩,途经上海转车,这自然想到长荣,想到曾任陕西省京剧团团长、省剧协副主席的著名演员——这位令人难以忘怀的好同事、好朋友,便电话请他预订转乘福州的火车票。长荣听说我们要来,急切地要我们一下车就到他家做客,下车再晚也要通知他。

心有所愿,又盛情难却,何乐而不为呢!

到上海的第二天中午,长荣就赶到我们的宿处上海戏剧学院专家楼。只见他红光满面、神采飞扬,光头,一双灵动的眼睛,一身凉爽的夏装,还是那股未变的谦逊随和劲,只是比前略胖点。他急忙说他昨晚要到车站去接,不巧有个演出任务,未能如愿。一面说着,一面用劲和大家一一握手,并狠劲地用热情而专注的目光注视着对方,那双和善、睿智而灼热的目光,明显地使人感到他对长安故友的一片真情。

他邀请大家下午五时都到他家去,他一切都准备好了,再三叮咛:一定要去,都要去。语态斩钉截铁,不容置疑、推脱。

下午三时半,我陪鱼讯和老伴邓平枝先到上海威海路文海大楼。四居室的套房,一套古色古香的红木雕花家具,显示出主人的雍容典雅。

他安置好鱼讯夫妇在卧室休息,在客厅和我促膝相谈。他说他实在想念长安,想念长安的故友。一听说大家要来上海,高兴极了。骊丽一早就上市场采买去了。他昨晚睡不着,忽然想到还缺一样油泼辣子,这可是老陕餐桌常备的一味佳品。于是,半夜又爬起来赶忙准备。

“到上海后,市委、市政府的领导非常关心,那是实实在在的。从工作到生活,都做了妥善而周到的安排。这套住宅是文海大楼里最大的,又是最好的层次,光线充足。楼里住的都是国家一级艺术家和师局级干部。市委书记、市长告诉我,在上海的一切待遇都不低于陕西,这次去北京开全国政协会,我见到了马友仙、贾平凹,心里有说不完的话呀!”

我频频地点着头,为长荣生活道路上这次重要的转折而高兴,为他到上海的顺达和机遇而兴奋。

“到上海后,院里的领导和同行们都很关照,排演了《智取威虎山》,恢复了《张飞敬贤》、《霸王别姬》、《牛皋招亲》、《牧虎关》几个折子戏。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广播电视台、

上海京剧院联合举办了“尚长荣加盟上海京剧院专场演出”。上海戏剧界的同仁为自己的艺术群体里走来这位才华出众的伙伴而欣慰,热忱的上海京剧观众们为他精彩的舞台艺术而倾倒。灼热之情,尽在“欢迎您,长荣”的横幅中。

长荣为我斟着茶,深情而感慨地看着我。说道:“三十二年前我由首都北京深入古城西安。不想三十二年后的今天又离开黄土高原来到东海之滨上海,从而踏上我三角形的人生旅程的新起点。我眷恋北京,怀念长安,更热爱上海。京剧起源于北京,开拓于上海,我愿从零开始,在孕育京剧的这片热土,吸收新的养料,结出新的果实,不断追求、探索、创作、演出,为振兴京剧作出新的贡献。”

他说:“上海文艺界的改革,步子迈得很大,上海京剧院人员缩编三分之二。他们在偌大的上海,都找到了自己更合适、效益更高的事情干。待会儿我准备给大家介绍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门铃响了。长荣盼望见到的长安故友,先后相偕践约。长荣忙着让座、打茶。骊丽更是忙前忙后,夫妇俩高兴得像小孩一般。大家都有一种老乡见老乡的感觉。

一闪一闪的闪光灯,留下了这难忘的相见。

一桌丰盛的家庭便宴,表达了他和骊丽对长安的一片深情。他频频地劝酒,一一地夹菜,生怕大家没有尽兴。

他口里喃喃地说着:我想念长安,怀念长安,真的想念长安,想念长安的故友,长安的羊肉泡馍、葫芦头。

是啊,长安有他和骊丽的亲朋,那也是他从少年以至进入不惑之年的“家乡”,留印着他和骊丽的爱情婚姻、家庭的记忆和足迹。

鱼讯深情地举起酒杯,“长荣,我和你爸是老朋友,(鱼讯时任陕西省文化局局长,省剧协副主席;尚小云曾任陕西省戏曲学校艺术总指导、陕西省京剧院院长)我为尚小云艺术大师有你这位好后代,为陕西出了你这位人才而高兴,祝你艺术长青。”

大家纷纷举起酒杯,为长荣的艺术长青干杯。

长荣为之动容,深情地说:“小时候练功,老爷子特严,稍有松懈,举鞭便打。那可是真打

啊！”他仿佛已感触到难忘的疼痛。“如果没有父亲的严教，也许就没有我的今天。”

长荣的眼圈红红的，苍苍华发的老局长、老主席鱼讯眼圈红红的，大家的眼圈红红的。人们都一时无言地沉浸在对那位和善慈祥的老人，那位携家带口义无反顾地来到“大西北”，为民族艺术事业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一代京剧大师尚小云先生的缅怀之中！

这时，谁忽然说了句：长荣，你回长安，我们就请你吃羊肉泡、葫芦头。说得大家欢笑起来，这才打破了一时令人难以忘怀的气氛。

长荣是不喝酒的。这晚他喝得不少。我们劝也劝不住。骊丽还在一旁说：他高兴，随他的意。他终于醉倒在走廊里，我们连忙扶起他。他还说：“没事，没事。我清醒得很，心里痛快。我……多么欢迎……你……你们有机会……常来来这里。”

一直闹到晚上八点多钟，可惜，长荣要说的话，上海文艺界改革的情况，未及说及。临别，从居室到电梯门口，他一一和大家拥抱，动情地拍打着对方的后背，眼里闪着泪花。

当我们走进电梯，看见他恭正而虔诚地站在室外，几次向大家深深地鞠躬告别，泪珠充盈

在眼眶，极力控制着感情，却掩饰不住抽搐的脸颊。

他还是那样谦逊、随和、热情、周到。

是夜，华灯初上，走进五光十色的上海街上，一种依依惜别之情涌上心头。我为长荣到上海大放光彩而高兴，更为他失落陕西而感慨。他毕竟是在陕西成长着他的艺术事业，《延安军民》、《射虎口》、《平江晨曦》、《张飞敬贤》、《将相和》，这一系列生动的舞台形象，为陕西人所熟知。而长荣却一定得走吗？如不走，仍留在陕西又怎么样呢？说不清的千头万绪，一路上，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此番离别，光阴流逝，历时已约十年有余，无缘再见到长荣。这期间，他先后荣任中国剧协副主席、主席，我常常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春节晚会上、在全国性的戏剧活动和一些大型庆典大会上，通过荧屏，频频地看到他演唱或化妆演出的风采。每逢此，便心怀喜悦。经济腾飞、日新月异的上海为长荣创造了充分展示他艺术才华的平台，而在他身上，毕竟有着陕西文化的烙印和光彩，又使人聊以自慰。

至今，在我心中，他还是一个“陕西人”。■



1990年4月26日，陕西省剧协召开“《曹操与杨修》座谈会”，
会后，尚长荣（左四）偕剧组人员和部分与会者合影留念